

西方城市教育史学之方法与特征

■杜冰川

摘要:城市是新的教育形式与教学方法盛行的独特环境。在庞大的城市史体系内部,城市教育史研究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边缘化了,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教育史学才迎来它的繁荣期。城市教育史的兴盛给史学界带来的是思想与方法论的转变,并将城市教育发展的心理与文化方面纳入研究范围,呈现出新的特征。

关键词:城市;教育史学;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杜冰川,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7)。

城市史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人们对同时期城市景观的兴趣正在觉醒中的一个方面。正如第一代城市史学家中有杰出影响力的 H·J·迪奥斯(H.J.Dyos)于 1619 年指出的那样,城市“是目前历史的镜子观测窗,它所折射出的是种族冲突、等级还有远远超出它本身的我们所处历史进程的产物——意识形态。”然而迪奥斯认为城市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有历史的。史学家们曾忽略了他们文化传统中的主要部分却避而不谈。此外,城市史还要被当做关键的城市研究而发展起来,同时也是一个为目前的城市问题研究提供非常必要的视角的一种手段。实际上,想要实现如此浩大的野心是困难的,而且城市史发展的许多动力来源于历史研究的内部变化。^[1]在庞大的城市史体系内部,城市教育史这类研究兴趣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边缘化了。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教育史学才迎来它的繁荣时期。城市教育史的兴盛给史学界带来的是思想与方法论的转变,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史学界,城市教育史的研究兴趣暴涨。^[2]

城市教育史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城市教育发展的问题上,重建了一个开阔的视野,即城市教育的特征及其发展反映了 19 和 20 世纪课程设置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两方面的改变。教育的普及化与教育年限的延长意味着专科学校的出现,这类专科学校能帮助人们为参加工业化劳动做准备,为全民参与新兴国家建设做准备。学校的建立旨在实现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旨

在使人们建立一种契约型人际关系而非以身份地位为基础的关系,形成一种冷漠的交往方式而非理性的交往方式,成为工厂和生产线上的劳动力而非乡野间的农民或手工作坊的工人。19 世纪学校教育、报纸、廉价报刊的普及,与 20 世纪收音机与电视的大众化一起,完成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这有效地提升了政府当局、行业专家和工业领袖的权威和影响力,尽管它还没能替代家庭、教会和地方的传统型权威。

一、城市教育史的研究方法

在城市教育史的诸多研究方法中,统计学和生态学方法在城市教育史研究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 1973 年,W·B·史蒂芬斯(W.B.Stephens)表明要用更分析化的方法来研究工业革命时期教育供给中的区域差异。史蒂芬斯在发表的论文中倡导利用计量的方法来比较教育供给情况和入学率。他继续不断地挖掘教育和读写能力增长之间的关系,将早期的论题扩展到探索读写能力标准的变化和阐明早期、中期维多利亚时代省级英格兰文化经验的多样性。他还指出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城镇和农村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地区的城镇和城镇之间。

主题式的地方研究依旧是探索那种多样化的意义的一个方法。至于受教育者,他们正在使用记录链接的方法为日渐复杂的工作提供一个环境,即在计算机辅助下从不同的数据资源中链取数据,这为建立一种更精确的关联提供了可能性。尽管一个成熟的叙事传统留存了

来,但城市教育的地方性研究在技术和方法论上也同样更复杂了。新著作通过估量一些社会因素诸如宗教派别的敌对势力、城市精英的角色地位、城市就业的有效性和特征以及社会和人口统计学的特征等来阐明教育资源供给、入学情况与当地社会系统的内在联系。

结构主义与生态学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在城市文化制度研究中也应用很广。比如,在那些当时很出名的科学史家的著作中,这种研究视角在探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成人教育机构时,就成了城市史和教育的媒介。根据维多利亚时期的城市文化和社会地理情况,这种分析方法更有针对性,如:谁建立了教育机构并提供经费,学员的就业情况,科学界一方面与郡和大都市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新型社会网络的关系等。在城市历史地理学家和社会史家看来,辨明文化、阶级与社区的关系是他们的合法权益。^[3]

社会控制方法的运用在实际上取得的成功,就是在意识形态对公众教育史的影响问题上,激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兴趣,尽管这种方法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当权者关系的时候并不是必须的。后来兴起的新论题之一就是教育与城市贫困之间的关系,正如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工厂学校、简陋改建的工业化学校和慈善孤儿院的教育资源供给情况和开办经验等。但每一个课题都用不相关的方法来研究,而且许多研究都只是描述性的,没有任何理论视角。

作为城市教育史的一种方法论,学校与社区关系的社会种族学已经极大地扩大了城市教育史学的领域。这并不是否认不同方法之间的矛盾或分歧。这矛盾或分歧体现在理论、政治方法与关注城市化方法上。例如,城镇、城市的人流集聚,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和已融入城市的社会、家庭关系的多样化。然而,这些方法是可以互相调和的,城市可以作为探究社会矛盾、政治协商的背景,而且这些研究与城市发展进程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二、城市教育史的特征

正如这种盛行的叙述方法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它内涵广博、语言精确,从那个只是局部性地关注城市教育经验的历史研究中脱颖而出。城市教育史家像他们所研究的那些改革家一样,通常一方面将城市称为社会张力的梦魇,另一方面又将城市比作知识分子寻求发展空间的港湾。城市教育史家都偏爱对上层精英的研究。他们将研究集中在城市生活的结构性特征上。而且他们通常都注重现代化教育布局的集中化趋势,并将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宏观结构的演变相联系。当他们发现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他们编撰的历史中又遗失了人的因素。结果,史学家们还是没能公正地对待城市教育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城市教育史的首要特征是,城市教育史家对上层精英的强调,使我们了解到城市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唤起并简化了对教育改革者动机的分析。而且,它揭示的是高

雅文化而非民间文化的演变,是教育的大传统(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而非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的发展。同时,它引领了对城市教育的历史的回顾,这个回顾展现的是有意促成的历史事件而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揭示的是教会的知识而非学会的东西。重视上层精英,还导致了教育的普及,以及科学和/或管理改革在20世纪头几十年中的大众化。

城市教育史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着眼于对现代生活的集中化趋势的关注,即在民族国家的产生,工业化网络的扩张与知识的普及中探寻城市教育史的起源与主要特征。实际上,教育史几乎只注重对宏观结构的分析;而对家庭、教会和当地社区的发展、当地的育儿习俗与标准,甚至学校与家庭生活的交集的分析都被忽略了。结果,我们在研究城市教育的发展时丢失了一个基本的要素,即整个的小众文化(非主流文化)和小传统。

城市教育史的第三个特征是,它集中讨论研究克利福德·格尔兹(Glifford Geertz)所谓的“生活的坚硬外表,即人们出生并生活的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无论教育史家们是否“从总体上研究了城市教育,或是通过生态学方法集中探讨特定的社会和教育网络,他们的研究对象总归是教育的结构而不是人的行为,而且总是通过对结构变量(密度、规模与多样性)的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即使是那些重建了社会网络的教育史家,也是想要向我们揭示城市教育经验的结构意义,而不是行为意义。因此,对于城市意识的特性与价值问题,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需要了解的要少得多。而城市意识的价值在于使人们转变一种观念,即接受教育不只是为了获得权力与地位,也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尊敬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也有一些罕见的例外——另外一部分史学家通过研究小范围的目标、方法和结构化发展,恢复了那个被删节的城市教育史,能让人立刻就想到的这类史学家有:丹尼尔·卡尔霍恩(Daniel Calhoun)、大卫·霍根(David Hogan)、詹姆斯·桑德斯(James Sanders)、伊恩·戴维(Ian Davey)、米歇尔·多赛(Michel Doucet)、罗纳德·D·科恩(Ronald D. Cohen)、雷蒙德·A·莫霍(Raymond A. Mohl)、文森特·P·弗兰克林(Vincent P. Franklin)、戴维·里德(David Reeder)、芭芭拉·M·布兰泽尔(Barbara M. Brenzel)以及尼尔·萨瑟兰(Neil Sutherland)。但他们只是开始将城市看做是一个教育环境,或者像丹尼尔·卡尔霍恩(Daniel Calhoun)那样,认为城市是“一种能实现自动化教学的环境,尽管混乱不堪,却也因此而行之有效。”“他们既没有具体地去研究普通人,也没有典型地研究城市环境对育儿方法、家庭和作为教育机构的教会在社会角色和事务上的影响。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教育史家试图将城市教育研究与有关人类发展、人际交往与沟通方式或身份认同过程的研究联系起来,但也只是开始集中研究人类社会形成时期的教育。”^[4]

三、城市教育史的研究范围

学界对城市教育史学的种种评价,要求史学家的工作要远远超出对结构、上层计划制定者工作的研究与宏观政策和经济的分析,要包括对城市经验、小到面对面的社会背景和进程、改革者的意图和普通人的教育经验的研究。为了考察这些城市教育经验的因素,教育史家们需要将城市的概念界定为一种文化的、心理的以及物质的和精神的环境。他们要研究教育精英们在“心理-社会”与结构环境方面的著作,并且不得不将教育看做是学习者与教师之间熟练的有计划的互动过程。

将城市教育发展的心理与文化方面纳入研究范围,并不是说它们比实际的物质条件更重要,尽管它们确实更有趣。这么做是为了平衡研究的视角,并且通过这种平衡来强化概念工具,进而挖掘出更完整、更真实的城市教育史。毕竟,这种对心理与文化现实的敏感性使得富于创造力的社会理论家们意识到“城市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认为城市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的、心理-社会的环境,创造着独特的文化传播方式。这类研究注重心理方面的考察,也使教育史家能够提出问题并检验教育指标的可靠性;这既能考察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情况如何,又能将教育意图与教育结果区分开来;它不会对超出个体和群体控制的因素视而不见,是再现人们曾经生活并经历过的历史的原貌并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

四、城市教育与文化传播

探究城市教育史的心理的、文化的和物质的的方面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阐明之前不为人知的或是不被承认的城市里的教育方法。当教育史家们阐明了为年轻人和小孩开设的专科学校的出现,他们普遍都将这些学校视为现代生活集中化趋势(如大众文化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建立、社会的工业化转型)的结果。

一般史学家采用各种描述-解释模型,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但总是忽略掉城市环境的心理-社会背景。一些教育史家好像仅仅把城市看做是大众文化的摇篮,由此组织并广泛传播国家的而非地方的思想意识。他们解释19和20世纪教育机构的兴盛,只不过是想要使国民文化标准化并将其传播,“集中管理信息和影响的神经中枢”,例如在美国,他们就试图将新教的、共和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秉性和信仰转变为国家标准和育儿规范。一些教育史家认为这些机构联合体的出现是人道主义关怀和慈爱之心的产物,他们在延长修业年限方面,更注重的是承诺而非实践、是利益而非成本、是愿望而非实际。另外一些史学家认为,城市需要通过教育将成长中的年轻一代培养成适于工厂和生产线的劳动力,因而城市不过是专业化的工作环境。“进步人士试图通过学校来应对工业革命的非人性化,而学校却以工业革命的最基本要素为运行模式,即工厂。集中化、官僚化和科学化管理的趋势最早出现在美国东部城市的学校系统里,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朝着南部和西部的乡村和小城镇学校系统延

伸。”^[5]对这些史学家而言,专科学校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社会对顺从能干而又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人的需要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作为工业发展的“侍女”,学校将提供必要的管理手段以对“市民的行为举止”施加影响。“教育家们发展出各种学校体制,这些学校的专业化结构部分反映了经济角色在更大规模的社会秩序中的分化。当雇主和职业联合会将从未有过的巨大信赖置于教育证书上,学校教育就获得了一种新的重要性,即成为迈向有利地位的通道。”^[6]

换个角度说,学校意味着教学环境的产生,它将合理规划教学安排并形成教育的制度化格局。学校是监管机构,它负责将潜在的疯狂行为控制在理性范围内,用规章制度约束儿童,瓦解社会习俗,最终形成产业习惯。这些史学家认为,制度建设的爆发意味着人们试图将儿童控制在规章制度、考勤钟和罚款的权威之下,而不是用更传统的教师个人权威来管教儿童。简而言之,现代教育机构是工业转型的产物和工具。无论教育史家们强调过什么或是研究过哪座城市,他们普遍都是根据大传统而非小传统、城际思想意识而非民间的信仰和情感、大众文化而非地方文化来解释教学环境的产生。而教师也“和不断增长的学校官僚机构之中的那些人一样”,“常常焦躁不安……当他们在他们的工会和专业联合会中到处夺取权力时,他们要求更大的保障、自主性以及更高的报酬。”^[7]

城市是新的教育形式与教学方法盛行的独特环境,近来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研究社会演进的著作中就直接提到过这个观点。诚如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所说,在城市里,偶遇陌生人的可能性增加,群体间对心理、身体边界的需要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城市里,“当地文化模式和外来意识形态共存;小传统和大传统、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共同发展。”城市不仅可以通过规模、异质性与多样性来进行区分,也可以通过个体和群体面对各种知识、信仰、感情和工作时所作出的抉择来区分。在城市,本国文化和工作文化会产生分歧。在城市,诚如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所说,文化开始出现多种分支,分成多个不同的领域,个体和群体必须理解这个多样与迥异的现实。

城市是令人迷惑的,尤其对那些刚来的移民和受到城市的驱赶或威胁的人而言更是这样,这也是城市的一个特征。因此,如克利福德·格利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言,城市为建立一体化结构(将当地公众生活、原始群体与国民状况相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城市会推动教育神话的构建,这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使得同一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分歧的人们能够利益均沾。另外,城市还能锤炼群体缓和和经济政治力量、改变心理社会环境的能力。如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说,城市不仅为培养各种默许的或明示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形式提供良好的环境,它们还增强了文化群体的适应能力。因此,城市就产生了有意培育和保护区的意图。

对教育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它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教育史家不再只重视教育团体和组织,如城市家庭、教会、少数民族报纸,甚至当地的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他们超越了对意识形态、监管控制和社会张力的研究,将当地和民间习俗、小意识形态和教育适应能力等纳入研究范畴。

这样来理解的话,对社会的研究必定要包括人们交流思想的教育过程。它不仅包括对心态的研究,还包括在小社会单位以及在大的所谓的次级单位里,对人们认识到的有关自己是谁、身份等级、价值观、人际交往和生活目标的研究。另外,它还涉及对家庭、教会、非正式联盟的系统化探究,这不仅是为了反映和优化经济环境、增强政治力量,还是为了培养人们的社会认同感,从而在不同群体间划清界限、加强社会联系、强制要求成员效忠于所属群体。

以这些方式来看,随着一个群体或另一个群体不断去维持、保护、培育、重建或转变社区,对城市教育史学下定义的复杂事件就出现了。芭芭拉·芬克尔斯坦(Barbara Finkelstein)在她的一篇著作里详细地描述了这类研究的可能性。她提到,我们或许最好将教育界限的出现理解为日渐分化的群体间围绕着年轻一代的种种权利进行争夺的这样一部冲突史。它研究新型的概念框架、物质资源和社区研究的方法论;它强调每个学校的工作犹如信念的组合,而不是规则或机遇的组合;它把以上那些同它们的当地环境、国家环境相联系起来,注重父母与孩子、教师与学生、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些关系是重建、转变社区形式的重要渠道;它重新定向了研究的主题,体现了个体和群体适应和/或改变与反抗、屈服于教育的方式。文章就研究主题转向个体与群体的内部文化提出了建议,探究若将教育观念强加于人有何意义;呼吁人们重新考虑传记研究的可能性,而不管它们是否反映了当时个人或家庭的生活状况;提请人们对移民的教育和经济历史作系统的研究。遗憾的是,文章本应同样呼吁人们系统地编撰史料,以重现家庭、社区和学校的教育史的原貌。实际上,托马斯·J·斯格里尔斯(Thomas J.

Schlereth)在他的代表作《美国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 in America)中就明确地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找寻史料的意义、探究家庭教育技术、解读历史遗迹与神话、民间艺术与制成品,为“解读格局”提供了指导。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教育史家能够很好地分析性利用照片、蚀刻版画和油画,而且这些可以起到装裱门面的作用,他们认为是自己引领了小环境中教育生活的重建。另外,针对文学和语言分析,这篇文章还没有提出精致的阐释。其中,关于文学和语言的分析已经被众多史学家们用来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事件,并把它们看成是变化中的心态的反映。^[8]

城市教育史学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我国却仍未得到广泛传播。集中研究这些方法,将会提高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能力,拓宽我们教育史研究的视野,并加强我们对教育变革过程的理解。这个取向势必会引领教育史家运用新的思想和方法论去探明一个国家的城市局部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David A. Reeder,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City: A Review of Trends in Britain, in Roy Lowe (ed.), 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Volume , Education in Its Social Contex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Press, 2000: 351-380.

[2] Bill Marsden and Ian Grosvenor, "David Reeder and the History of Urban Education, History of Education", May 2007, Vol. 36, No. 3, 303-313.

[3][4][8] Barbara Finkelstein, Redoing Urban Educational History, in Roy Lowe (ed.), 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Volume , Education in Its Social Contex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Press, 2000: 381-401.

[5] Sol Cohen, Revisiting the History of Urban Education: 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s, in Roy Lowe (ed.), 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Volume , Education in Its Social Contex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Press, 2000: 402-426.

[6][7](美)戴维·B·秦亚克.一种最佳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M].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陈国庆

An Exploration of the Study of Western Urban Educational History

Du Bing-chuan

Abstract: Urban educational history finally flourished until 1960s and 1970s, although urban was an unique environment for new education form and teaching method. The study of urban educational history came to a good time in Australia, Britain, Canada and America, and its flourish brought the historian circle an exchange of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It applied various research method and called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urba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to view, thus presented new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Urban; educational history; cultural transmission